

文/冯长根

# 博导、博士生科研复述和杂谈(30)

## ——博士生把“待遇”当“称砣”令人担忧

社会生活中有一类极为普遍的现象,我们或许可以命名为“称量现象”。一个人的品行是好是歹,一件事的份量孰轻孰重,人们心中似乎有一杆“称”,大家的评判通常会令人震惊地一致,特别是真相被公之于众的时候。

这杆“称”的份量在于“称砣”。对于社会生活是如此,对于博士生的攻博,其实也是如此。许多博士生的最终成功,流了一身一身的汗,走了弯弯曲曲的路,他们心中的“称砣”是沉甸甸、光灿灿的。在抗日战争的年代,西南联大有着那么一批莘莘学子,在极其艰苦的学习、生活条件下,发奋学习,他们心中的信念是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这就是他们的“称砣”。那时怀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在延安各学校的年轻知识分子们,他们后来成了新中国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群体,为新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国家命运》,向我们讲述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杰出知识分子群体——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科技战线上的灿烂群星。在他们攻克科技难题的经历中,尽管面对着今天我们难以想像的国际险境、工作危难、生活困境,他们不仅没有后退,没有倒下,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,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们心中的那杆“称”,那个“称砣”,叫做“国家命运”。没有他们,也就没有中国人民因“两弹一星”带来的扬眉吐气。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些名字:聂荣臻、钱三强、钱学森、邓稼先、郭永怀、王淦昌、朱光亚……这是一串不朽的名字。《国家命运》值得一看。

引起我注意的,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“称”。其中的一些,令人担忧。最近,我参加了全国博士生年会。会上特邀了王乃彦院士作了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报告。在互动的时候,一位博士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:某位与他同一个导师的博士生毕业时,他特地找到毕业的同学,请他介绍如何做的博士论文。没有想到的是,毕业的博士生竟然回答说,论文上的数据都是假的!为了说明这样做有“理”,他“理直气壮”地补充了一句:博士生这么低的待遇,“我在论文中做了的,已经对得起我的良心!”

我遇到过做假的,但没有遇到过这么理直气壮做假的。做假肯定是不允许的,因为这是违反科学道德的,但真正令人“震撼”的,是做假者的“理由”。待遇低就可以做假吗?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若这样,那就等于在说“穷人家的孩子做小偷合理”。这后一个推论是绝对不会被人们的那杆“称”所接受的,而且也不会被经济条件暂不好的家庭所接受(这含有侮辱之意)。王乃彦院士从科学规范方面回答了提问。我后来补充了一句,请提问者转告那位毕业的博士:“待遇低,不能成为做假的理由!”

博士生把“待遇”(实际上博士生的助学金或补助,称不上是“待遇”)当成人生或办事的“称砣”是当前某些社会思潮的投射。带着这种思想攻博,又走上社会,很难说他会有一好前景。

就“待遇”而言,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,由于各方不断努力,也不断在传出

改善的消息。我们也希望国家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措施。但同时,博士生把攻博时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从“待遇”上稍作转移,集中力量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,是值得的。

在“待遇”这样一类问题中,有个问题倒是应该引起你的重视,这就是“科技人才个人发展空间的阶段性”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某个“历史”(其实是“历史阶段”)的人。在学位制度建立之前,同样是大学毕业,他们没有进一步的“学位”可以攻读。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是旧的“历史”的人,而你我是新的“历史”的人。历史真是无情。在另一方面,在改革开放之初,高校恢复学生招生,理、工、农、医、数、理、化、天、地、生大铺摊子,而且“青黄不接”那样的形势和任务,对于科技界青年知识分子的要求远不同于今天,发展空间大,起点低……,阶段性特点不同,而且是很不相同。今天,你想要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,“门槛”越来越高。因为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是要创造中国科技“新历史”的人们,优秀群体越来越多,基础条件越来越好,科研投入越来越强,人们的学术水平非比往昔。对于博士生而言,发展空间相对“小”了(质量要求可是高了很多)。你真正要防止的,是被“历史”所抛弃。也许,就在你于“待遇”耿耿于怀之时,许多年轻博士生正着手迎接新的历史机遇,为此奠定个人发展的扎实基础,以此贡献于社会和国家。他们,我相信还有你,正是推动科学技术“历史”前进的人!博士生同学,勇敢地走进属于你的“历史”之中吧!